

对中国农村这个包罗万象的载体

一位睿智的美国人有着清醒的宏观把握

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将湿手指放在纸窗户上」

使得纸窗户留下一个小洞

里不动声色地观望

的是隐藏在深处的本质

Village Life in China

中国的乡村生活

[美]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著

陈午晴 唐军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Village Life in China

中国的乡村生活

[美] 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著

陈午晴 唐 军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乡村生活 / （美）明恩溥（Smith,A.H.）著；陈午晴，唐军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6

（寻路中国系列）

ISBN 978-7-121-16912-0

I. ①中… II. ①明… ②陈… ③唐…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4902 号

责任编辑：李 影 特约编辑：叶小梅

文字编辑：李 欣

印 刷：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5 字数：223 千字

印 次：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译 序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美国人，用自己的睿智影响了他的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也用他的学识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这个人就是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明恩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弗农城（Vernon），毕业于威斯康星州一所带有公理会传统的文科学院——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作为基督教公理会派出的传教士，他和妻子艾玛·简·迪金森（Emma Jane Dickinson）于 1872 年来到中国，最初在天津，后来又回到山东，在恩县庞家庄（今山东武城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又先后开办了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通讯员。义和团运动前后，明恩溥移居通州，更多地专注于思考和写作。

明恩溥深知文教对于一个国家及其国民未来的影响，也了解文教投资能够产生何其深远的影响，遂于 1906 年专门向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进言，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办文教。正是在明恩溥等人的大力推动之下，美国于 1908 年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 1160 余万美元，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在鲁西北传教的 30 余年间，明恩溥到过山东、天津等许多地方，对于

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多有了解也多有思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中国的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 a Study in Sociology, 1899)、《骚动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 1901)、《中国的崛起》(The Uplift of China, 1907)等大量著作，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社会及其民众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正如《中国的乡村生活》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明恩溥试图将他对中国村落社会的考察上升为一种社会学的学术研究，这一努力可以从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是贯穿全书的结构—功能分析的思路。明恩溥虽然没有如今人那样去明确区分实体结构、关系结构或规范结构，但他却同样有效地发掘并透视了支撑中国农民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的构成要素，如道路、渡口、水井、商店、学堂、庙宇等实体性要素，科举、宗教、集市、融资、护场等制度性要素，求雨、狩猎、婚庆、丧葬、年节等仪式性要素，以及地痞、士绅、男子、妇女等群体性要素，特别是所有这些要素在型塑中国村落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理。不难看出，明恩溥的思路与早期结构—功能学派学者的思想高度一致，他们都在追求准确把握此后如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等学者所谓的“标准化的社会项目在协助特定社会系统适应或调节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

其次是对社会学及其从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所借用并改造的实地研究方法的运用。除了二手文献的收集和利用之外，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细致的观察以及某种程度的住居体验，对于作者搜集经验素材的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借助这样一些有效的方法，读者甚至能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仿佛被作者引领到百年前中国某个村庄去游走、听闻、观看、议论的奇特而宝贵的体验。

最后是在经验描述基础上进行理论解释的学术自觉。这一点可以说存在于全书的分析描述之中，但特别充分地表现在明恩溥对中国农村生活贫乏、家庭脆弱等现象的解释方面。针对前者，他从国民性、精英局限、乡土文化等方面加以说明，针对后者，则从婚姻家庭制度与司法制度、伦理道德体系等之间的紧张入手加以说明。明恩溥最后特别阐明了他自己关于基督教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从其关于基督教在儿童社会化、婚姻家庭制



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说明中，读者依稀可以看出明恩溥与稍晚于自己出生的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思路的相似甚至一致。

不可否认，明恩溥全部的分析说明当然受到其固有的民族立场和宗教情结的影响和支配，一些观点难免偏颇，但作为一个生于“异社会”、长于“他文化”的局外人，明恩溥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所做的观察和思考为我们回溯中国的过往、规划中国的未来提供了一面难得的镜子。正如他对中国人以“爱面子”、“徇私情”等为表现的国民性的剖析，就常常令我们产生有如芒刺在背的感觉，而不得不叹服他独到的眼光，这也是《中国的乡村生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仍具阅读价值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乡村生活》中译本最早于 1998 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后于 2006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今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作为译者，我们十分高兴这部著作可以更多更好地发挥其启迪作用，遂将读、译过程中的一些心得感受略作整理、记录于此，聊以为序，顺对电子工业出版社李欣编辑的认真协调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唐 军

2012 年 2 月 20 日



前言

本书基于这样一个立场：作者在中国有过丰富的生活经历之后，对中国人无数的优秀品质深表尊重，并对大多数中国人怀有强烈的个人敬意。中华民族不仅有着举世无双的过去，也必将有光辉灿烂的未来。然而，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实现之前，这个民族还存在许多必须克服的缺陷。一个人越是了解中国，越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贸易、外交、政治关系的扩展，以及与西方文明的接触，都不足以达到中国真正需要的改革。

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我们不必过于强调中国在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其实，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也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思潮中被广泛议论，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个帝国在 20 世纪开端将不会更受关注。应当说，任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作品都会增进人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本书的完稿，即是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粗陋的贡献。

明恩溥

Village Life in China

目 录

译序	/ III
前言	/ VII
第一章 中国乡村	/ 1
第二章 乡村结构	/ 5
第三章 乡村名称	/ 13
第四章 乡村道路	/ 17
第五章 乡村渡口	/ 21
第六章 乡村水井	/ 25
第七章 乡村商店	/ 29
第八章 乡村戏剧	/ 33
第九章 乡村学堂和游方书生	/ 45
第十章 中国科举制度及教育改革	/ 71
第十一章 乡村庙宇和宗教团体	/ 87
第十二章 宗教仪式的协作	/ 91
第十三章 市场及集会的协作	/ 95
第十四章 协作的贷款团体	/ 100

第十五章	看护农作物的团体	/ 107
第十六章	城乡求雨	/ 113
第十七章	乡村狩猎	/ 116
第十八章	乡村婚礼和葬礼	/ 120
第十九章	乡村新年	/ 132
第二十章	乡村地痞	/ 142
第二十一章	乡村头面人物	/ 152
第二十二章	乡村男孩和成年男子	/ 158
第二十三章	乡村女孩和成年妇女	/ 171
第二十四章	乡村生活的单调和贫乏	/ 204
第二十五章	中国家庭不牢靠的平衡	/ 208
第二十六章	家庭的不稳定性	/ 212
第二十七章	基督教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 222



第一章 中国乡村

单单一个印度，就有五十多万个乡村。而在整个亚洲，乡村的数量则或许是这个数字的四倍。至今为止，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大部分人都住在乡村。来到中国的外国游人，如果从某个港口，比如天津出发，一直沿着同一个大致的方向旅行，大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其版图的另一边沿。在这次旅行中，住在城市中心之外的难以想象的巨大人口数量，必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也只有亲眼目睹的人才能获得。与西方人流行的观念相反，相对全部人口来说，中国大城市数量并没有西方那样多。许多地区级的城市、县首府，只不过是一些带有围墙和衙门当局的大乡村。众所周知，印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农村。而在中国，我们或许没有理由认为住在农村的人口数量会少于这个比例。

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旅行中，不熟悉中国的外国游人一直会这样自问：这些不计其数的人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其内容和范围如何？

像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不经充分解释，则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中国人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完全不同于那些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情况。任何想当然的看法都是不可靠的。在某些基本的一致性当中，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迷幻和令

人费解的多样性。无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已经居住了多久，总是有许多事情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而这些事情又被认为是每个人凭直觉已经知道的。即使是资格最老的外来居住者，也与其他外来的居住者一样，是一个学生。

这种状况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必然产生的结果，而且它以宏大的规模来达成其效果。正如柯库侯姆（A. R. Colquhoun）先生所洞察的那样：“由无数的累积持续导致的产物一定是巨大的，如果再加上第三个因素，即隔离，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文明的复杂特性和奇特的保守形式感到任何的惊奇。”^①基于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对中国人的生活现象进行连贯而又有序的解释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的。这就需要将所有在中国的外来长期居住者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使其完整起来。当然，这种协调将是几辈子的工作，其最终作品将充满整个伯德莱思（Bodleian）图书馆。为了扩展我们关于这个海洋般广阔的主题的知识，唯一的实践途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详细考察所有进入我们视野中的这种现象。诚然，没有两个人会有同一个视野，也没有哪个人的视野会固定于同一个范围之内。

应当说，要观察一个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一个上好的方法就是揭开其屋顶，不过，其前提是不能干扰房子里的人。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人，就必须揭开他们的屋顶，去了解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这对于外国人来说，难于上青天。不过，他可以模仿中国人，将一个湿手指放在纸窗户上，使得纸窗户上留下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至少能够观察到某些东西。虽然本书由一些既不同质又不太连贯而且相当不精致的章节组成，但是，这些章节都是关于中国人实际生活现象的研究，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即有赖于上述“窥洞”。

来到中国的外国游人经常被无数的城镇和小村庄环绕着，他自然想知道所经过的地区有关人口的一般情况。不过，如果他贸然地询问某人关于某城镇或其所在辖区的人数，那么，他得到的回答无非是“不少”或“谁知道”。

① 一个关于中华帝国在 19 世纪末正在经历重大危机的思考，没有归入本书。任何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都应该专心地参阅 A·R·柯库侯姆先生的大作《转变中的中国》，（1898 年同时出版于伦敦和纽约）。该书体现了一个颇有造诣的旅行家以及一个富有经验的东方国家行政官员的成熟信念，而且是通过第一手的资料来了解中国的。

差不多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能大致说出他所在的县里有多少个村庄，至于哪个村庄大哪个村庄小，则不一定清楚了。而且，中国人与其他的东方人一样，绝对不在意什么统计数字，他们对于平均意义上的东西只有最初始的观念。中国人根本不懂得统计数字所反映出来的含义。



南方乡村风貌

显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信赖中国官方的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却是我们进行理性判断时能够依据的唯一基础，因此，它们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现在我们意识到，要获取每平方英里上真实的人口资料，一般得从大单位如省，至少是府开始着手，其基础和上层结构就像是有待猜测的宝塔构造。

几年前，我们在一个县里以一个很有限的区域作为测量单位，对其人口进行了一次比较准确的计算。我们以国外居住者为中心，取一个半径为 20 华里的圆圈，在这个圆圈内对每个乡村于 1878 年受到饥荒救济的情况制定一个表，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对家庭的平均数作出一个近似的推测。其结果是，总共有 150 个乡村，以每家 5 人计算，乡村的平均规模是 80 个家庭，该区域内总人口为 6 万人。由于 20 华里等于 6 英里，因此，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就是 531 人，约等于比利时王国（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的人口密度，该国 1890 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 534 人。

在这个圆圈之外几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作“十三村”的地带，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就是因为在其5华里的距离内正好有13个乡村！这表明，在特殊的地区内，上述人口推测的方式是不适宜的。由于黄河的老河床吞噬了广袤的陆地，该地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被废弃了，也就不再有乡村。还有一条从大运河导向大海的水道和一长条海拔远低于一般平均值的洼地，由于这里经常发生洪灾，所以很少有村庄。

既然存在这样一些原因，我们当然需要在一个适宜的地点重新进行测量。我们重新选择的县属于临清（音译——译者注）府的某个县，位于该州府东面90华里的地方。这个区域只有前面那个选点的一半大。我们这次去不仅仅是测量乡村的平均人口数，而是计算每个乡村目前的实际家庭数，本地人是知道这个数字的。当地中心地带某乡村的一个本地人我们准备了区域内的乡村地图。这个人颇有见识，他让每种情况下的人口估算都略低于一般的推测值，从而保证了我们的推测不超过实际的范围。他指出，一个家庭的人数仍然以5个人计算是完全不恰当的。许多单一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并共同拥有所有的物什，他们因此而被计为一个联合的家庭，而实际上这个家庭可能有20个人。在外国游人看来，这个地区的乡村似乎不仅规模大，而且密实地串在一起，事实上，统计细目确实显示了这种情况。在一个半径为10华里（3英里）的圆圈内，有64个乡村，最小的乡村有30个家庭，最大的乡村有1000多个家庭，平均每个乡村有188个家庭，家庭的总数是12040个，以每个家庭5人计算，整个区域内人口总数是60200人。因此，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129人。

显然，在直隶（相当于今河北省——译者注）的南部和中部、山东的西部和西南部、河南的北部这三地，有着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儿的乡村和上面那个地带一样人口稠密，因此，我们同样只能近似地估测其人口的状况。不过，就中国北部整个平原而言，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进行推测：人口稀疏的县，其人口密度大致是每平方英里300人；人口稠密的县，其人口密度大致是每平方英里10万到15万人。无论如何，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众多的人口拥挤在这些肥沃而有历史意义的平原上，同时，要想得到真实的“人口普查”资料，确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二章 乡村结构

五百年前，明朝的奠基者朱洪武的侄子从中国南部的首府向北部的元大都（即现在的北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史称“阎王的北方扫荡”）。现在人们一般认为，这个受到赞美的攻击者一路上几乎杀死了他所碰到的所有人，以至于从长江到北京一带都已经成了不能居住的荒漠。出于修复的目的，当时的统治者从山西南部和山东东部进行强制性的移民。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大量来自山西南部某城市的人被集合起来，然后又被分配到那些由于战争的破坏而无法耕种的荒地。在中国北部平原的许多地区，居民们除了知道他们来自哪个城市之外，并不知道更多的迁移背景。

中国人确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尽管他们对方位有一种本能的直觉，以至于能说出某种疼痛发生在胃的“左边”或“右边”，可是，他们对自己城市的形状整齐与否却漠不关心。每个中国城镇似乎都是四四方方的，不过，并没有哪个城市是完完全全的四方形。相对而言，城墙总是出于风水的缘故被特意设计成某种曲线和不规则的样子。换句话说，这种曲线和不规则能带来好运，能避邪，这是风水在发生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城门一定不能相互正对着，如果正对着的话，中间也得有某种障碍物，以防魔鬼在城里顺利地进行扫荡。

在西方，人们已经习惯于说“布置”一个城市或城镇。然而，这种说法用在中国乡村上则是极不适宜的，因为“布置”意味着相关部件安排上的设计。中国乡村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晓得，也没有人去理会它的前因后果。在那遥远的、无法确定年代的、朦朦胧胧的过去，有几户人家从其他地方来到这儿安家落户，于是他们就成了所谓的“本地居民”，这就是乡村。它有一条路，或许是几条路的一个网络，但是，若非偶然，一般不可能有两条路会刚好平行，也没有哪条路会正好笔直不弯曲。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人们已经发现路是增进乡村各部分之间以及乡村与外界之间相互沟通的必不可少的通道。然而，乡村的路不仅会突然地、莫名其妙地拐弯，而且在不同的地点宽窄经常变化。有时，在一个乡村四分之一英里远的距离内，竟然没有一条路能让车辆从前街开到后街，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会去修补它，即使大家都不愿意这个样子。在主街或其他一些街道上的右角，有狭窄的小道，一些住家的庭院就直接设置在这种小道上。甚至有的房屋建筑就直接挨着主街，除了一堵昂贵的死墙，也没有什么值得观赏。如果在公路上有什么门道的话，那是为了防止恶魔的入侵。因此，一个乡村就是一个微型的城市，同样有着高度拥挤的各种弊病，尽管它可能位于一个辽阔且相当不适于居住的平原上。无论土地是贵还是贱，乡村总是同样的拥挤，而且，村民们同样地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予理会。

这一带区域的山上有着挖掘不尽的石头，当地乡村居民的房屋住宅就是用这些石头作为建筑材料的。这些住宅一年四季都显得灰暗、潮湿、不卫生，在梅雨季节尤为如此。更令人不舒服的是，那些黄土高原地区的居民构筑的窑洞，只在洞前有点光亮，洞内则一片漆黑，而且还通风漏气。对于这种建构的所谓房屋，任何防备措施都是奢侈多余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盖房子最通用的材料就是那种手边最近的东西。到处都大量地做砖，颜色差不多像他们身上所穿衣服那样的蓝灰色。这种颜色是在紧紧密封的砖窑里形成的。当砖烧好时，从顶端凹口处倒入几百桶水以冲掉砖块上的泥土，水一遇热，立即转化成蒸汽，从而改变了砖块的色泽。由于燃料稀少，人们不愿意浪费它，这使得砖块普遍烧得不结实，因而降低了其作为建筑材料的价值。它不像西洋砖那样坚如硬石，而且有一层厚厚的



釉。大部分中国的砖块，随便一摆弄就容易破裂，仔细检察，它们更像精制的面包，充满了气洞。每个气洞口都成了砖块吸收湿气的管道，因此对房屋有着极大的损害。

大多数农村的住房就是简单地用土砖做成的。将湿泥土塑造成砖坯，等到干了，不再皱缩了，土砖就做成了。这些砖块大都有两到三英寸厚、一英尺宽、约二十英寸长，完全干后的重量也超过四十磅。那种以土坯形式风干的土砖的成本是每块不到一个铜币；那种需要在模子里用重石夯结实的土砖的成本是前者的三到四倍。如果请专人做这项工作，那么花费就要大得多，不仅要提供人力运水，还要备茶备烟。

与其他房屋一样，土砖房的地基也必须有砖，在离地面一两英尺的高度，还必须有一层芦苇杆或其他什么东西，以防湿气上升到墙内，否则，它就会像雨中的糖果房子那样容易消溶。由于中国北方大平原的土壤里有许多盐碱，如果不是特别小心在意的话，房屋结构过上几年就会显示出衰颓的迹象。

屋顶由若干柱子支撑，不管房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柱子的材料被认为只是其中的填补物。不过，为了节约，便宜的房子一般不用柱子。其结果是，在多雨的年头，许许多多房屋都着实饱受湿气损害地基之苦。许多人因此而丧生，更多的人因此而伤病缠身。在某些县区，人们能够看到类似于洋房的屋顶，但一般都是具有前后柱子的形式。不管哪种形式，都是纵长的栋木支撑着小桁木，其上薄砖，更经常地是芦苇杆、麦杆或高粱杆，再上面是一层厚厚的泥土，构成了屋顶的主要部分。这些泥土吸收湿气之后变得特别重，一旦栋木腐朽，就非常危险。屋顶通常是扁平的，能够存放农作物和柴火。

如果乡村位于地势较低的地方，人们就会堆起一个土墩，然后上面进行建筑。但是，不管农村的自然条件如何，这么多泥土的消失都在乡村周围留下了许多巨大的土坑，这些土坑又将附近区域的地下水汇集在一起，从而成为鸭、鹅、猪戏水的场所，在夏天，甚至光屁股的小孩也乐在其中。

丰富的雨水滋润了乡村繁荣茂盛的丛林，远远望去，还真如一种迷人的风景。不过趋近一看，那些可爱的老树只是在给地下的泥洞遮荫，而乡村的

房屋却暴露在夏日炽热的阳光之下。在乡村的街道上确实有树，不过，这些树不是用来给庭院遮荫的，庭院几乎完全享受不到任何树林的荫庇。甚至在某些地区，像葡萄藤这样相对难看的泥土颜色而显得自然、美丽的调剂物还要遭到禁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葡萄的树枝朝下，而其他的树枝朝上，于是，葡萄藤似乎就自然会给人带来不幸！

有一个人，他的祖父很富有，当年拥有一套两层建筑的住宅，这在当地是相当显赫的了。他告诉笔者，当年他的祖母经常在住宅前面的高建筑和那些为下面的院子遮荫的大榆树上装饰一些东西，以至于根本没有地方晾晒衣服。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个家庭逐渐败落，两层建筑的房屋被拆毁，大榆树被砍伐，到现在这一代，已经和其他家庭一样，全家人在夏天挤在一个狭窄的院子里热得发昏。不过，倒是可以到处晾衣服了，然而，他们事实上也很少有什么衣服去晾。那种房屋住宅所拒绝的华丽是与神同在的，神没有什么衣服需要晾干，只需要门前有一个小寺庙和一片老树丛。

简单地说，中国的房屋建筑由三部分构成，两侧和前后墙是立起来的部分，其顶上是横跨着的第三部分。有些屋顶的形状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早先帐篷的样子。当然，就像威廉姆斯（Williams）博士及其他人所说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中国的屋顶与帐篷之间有什么联系。由于整个民族都没有人愿意盖高层建筑，因此，中国的多数城市都呈现单调一致的样子，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中国城市的面貌不那么吸引人的话，外国游人也未必期望在农村能寻找到什么建筑来满足他的审美需求。在汉语中，根本就没有“美感”这个词，即使有，乡民们对它也没有任何兴趣。房屋一般建在庭院的北端，面南而立，如果需要增补什么结构，那么，一般是安置在主建筑的右边，坐西朝东。如果整个房屋比较大，那么，庭院的前墙可能由其他的房子组成，和后面的主屋一样，也有侧面的附属建筑。不论家庭大小还是贫富，这是住屋的常规类型。在城市，这种类型可能由于空间紧缩而发生变化，但是在农村大多如此。

在中国，房子的数量不是指屋子的间数，而是指整个建筑物中那些适于被一段木料架房子隔的的间数。由于这些木料的长度一般很少超过 10 到 12